



丛书主编/任定成

国科大 文丛 |

科学与人文 的交融 (下)

龚育之 ● 著



科学出版社



国科大 文丛 |

丛书主编/任定成

科学与人文的交融

(下)

龚育之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与人文的交融. 下/龚育之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国科大文丛)

ISBN 978-7-03-037889-7

I. ①科… II. ①龚…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自然科学-文集
IV. ①C53②N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1925 号

丛书策划: 胡升华 侯俊琳

责任编辑: 石 卉 程 凤 / 责任校对: 韩 杨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 sciencep. 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立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8 1/2

字数: 532 800

定价: 9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国科大文丛

顾问

郑必坚 邓 勇 李伯聪
李顺德 王昌燧 佐佐木力

编委会

主 编 任定成

副主编 王大洲 张增一 诸葛蔚东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方晓阳	胡新和	胡耀武
胡志强	刘铁军	马石庄
孟建伟	任定成	尚智丛
王大洲	肖显静	闫文军
叶中华	张增一	诸葛蔚东

丛书弁言

“国科大文丛”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策划和编辑的一套关于科学、人文与社会的丛书。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及其前身的学者和他们在院内外指导的学生完成了大量研究工作，出版了数百种学术著作和译著，完成了数百篇研究报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和译文。

首辑“国科大文丛”所包含的十余种文集，是从上述文章中选取的，以个人专辑和研究领域专辑两种形式分册出版。收入文集的文章，有原始研究论文，有社会思潮评论和学术趋势分析，也有专业性的实务思考和体会。这些文章，有的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对学术发展和知识传承起过积极作用，有的只是对某个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一孔之见。文章的作者，有已蜚声学界的前辈学者，有正在前沿探索的学术中坚，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新锐。文章或成文于半

个世纪之前，或刚刚面世不久。首辑“国科大文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56年于光远先生倡导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1962年，研究组联合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1977年，于光远先生领衔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次年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1984年，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更名为自然辩证法教学部。1991年，自然辩证法教学部更名为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学部。200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学部随之更名为社会科学系，并与外语系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一起，组成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002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更名为人文学院，之后逐步形成了包括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新闻与科学传播系、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系、体育教研室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内的五系一室一刊的建制。

2012年6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建立了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两个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拥有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两个学科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哲学、科学技术史、新闻传播学、法学、公共管理五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从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到人文学院的历史变迁，大致能够在首辑“国科大文丛”的主题分布上得到体现。

首辑“国科大文丛”涉及最多的主题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科学思想史。这四个主题是中国学术界最初在“自然辩证法”的名称下开展研究的领域，也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成立至今，我院师生持续关注、学术积累最多的领域。我院学术前辈在这些领域曾经执全国学界之牛耳。

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在我国复兴并引起广泛关注的领域，首辑“国科大文丛”中涉及的这四个主题反映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自成立以来所投入的精力。我院前辈学者和现在仍活跃在前沿的学术带头人，曾经与兄弟院校的同道一起，为推进这四个领

域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人文学院成立以来，郑必坚院长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命题，我院学者倡导开辟工程哲学和跨学科工程研究领域并构造了对象框架，我院师生在科技考古和传统科技文化研究中解决了一些学术难题。这四个主题的研究也反映在首辑“国科大文丛”之中。

近些年来，我们在“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的工作基础上，组建团队逐步在科技新闻传播、科技法学、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三个领域开展工作，有关研究结果在首辑“国科大文丛”中均有反映。学校体育研究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工作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工作成果能够反映在后续“国科大文丛”之中。

从首辑“国科大文丛”选题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们的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技新闻、科技考古，是与传统文史哲领域相关的人文学。我们的科技传播、科技法学、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是属于传播学、法学和管理学范畴的社会科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在若干个亚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健全的大学应当有功底厚实、队伍精干的文学、史学、哲学等基础人文学科，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适度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群的存在，不仅可以使已有人文社会科学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优势更加持久，而且可以把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理工科大学的人文氛围建设之中。从学理上持续探索人类价值、不懈追求社会公平，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追求中传承学术、培养人才、传播理念、引领社会，是大学为当下社会和人类未来所要担当的责任。

首辑“国科大文丛”的出版，是人文学院成立10周年、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建立35周年、自然辩证法组成立56周年的一次学术总结，是人文学院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奉献给学术界、教育界和读书界的心智，也是我院师生沿着学术研究之路继续前行的起点。

随着学术新人的成长和学科构架的完善，“国科大文丛”还将收入我院师生的个人专著和译著，选题范围还将涉及更多领域，尤其是基础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也将以开放的态度，欢迎我院更多师生和校友提供书

稿，欢迎国内外同行的批评和建议，欢迎相关基金对这套丛书的后续支持。

我们也借首辑“国科大文丛”出版的机会，向中国科学院大学领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基金会、我院前辈学者、“国科大文丛”编者和作者、科学出版社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任定成

2012年12月30日

代序一 走过来的路^{*}

追 求

1948年，作为一个追求科学的青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作为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和科学交叉的人生道路。

引我走向科学的，是我的小学（宁乡靳江小学和自得小学）和中学（靳江中学和明德中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老师。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我的小学老师杨伦杞先生在课堂上讲算术，正如此这般地解一道时钟问题，我的同学李救功和我觉察到他的解法错了，当堂提出异议。老师不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不同意老师的意见，相互辩驳，争执不下。许多同

^{*} 本文原是1986年龚育之为《科学·哲学·社会》一书所写的跋，2004年作者对跋文增补“牛棚”一节之后，又以它作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本）的跋，并加标题“走过来的路”。

学不以我们的态度为然。我们这位老师，真是一位难得的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好老师，他不以我们的看法为然，却不以我们的态度为忤。说不服我们，他立即回到卧室拿来一只闹钟，当场旋转长短针。结果证明他错了，我们对。他沉吟了一会儿，又滔滔地给大家讲，他是怎么错的，我们是怎么对的。我提起这件事，并不是自鸣得意，在我的一生中，我解错的题难道还少吗？我记着这件事，是因为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科学真理的权威，独立思考的力量。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学生，是多数，还是少数。虚心学习又独立思考，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你就能获得真理。我很感谢我的老师，我多么希望自己和大家在解人生道路上的各道算题的时候，都能按照老师教给我的那种科学态度行事！

引我走向革命的，是时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她的绝大多数儿女都分担了她的痛苦。从童年、少年到青年，我目击和身受外国侵略者的凶残、本国统治者的暴戾。我与我的中学和大学的许多同学一道，投身到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时代潮流之中。国民党、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孰是孰非，孰优孰劣，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哪里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我们是经过观察、比较、思考，才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我们的选择，不是马克思主义书本教给我们的。相反，是生活和历史的基本事实帮助我们做出选择，才引导我们去接触马克思主义书本，去理解我们所选择的、在黑暗中给我们展现出光明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她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立即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喜悦。我觉得，这些著作清晰地和透彻地分析和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历史、现实和前途，一如自然科学清晰地和透彻地说明了自然的现象和规律。在我面前展现了一门新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选择革命，参加共产党，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可言，要准备的倒是个人牺牲。对个人生命的可能牺牲，我们那时大多还不大在意，虽然在学生运动中也确实有一些同志为革命付出了生命。比较费踌躇的是两件事：一是可能要牺牲原来追求科学的学业；二是可能要牺牲个人自由，承担服从组织决定的义务。我的一位同学说过这样一句话：“哪怕哀鸿遍野，只要有一间实验室，我就要关在里面做实验。”这无非表示对科学的执著。然

而，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家，毕竟是有良心的，是为人类的。我这位真诚追求科学的同学，到底还是参加了罢课、游行，站到为遍野的哀鸿谋生存和幸福的斗争行列中来了。另一位同学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非得参加组织？你看，只有牛羊成群，而虎豹都是独来独往的。”但是，绝对自由、各行其是、独来独往的散漫一群，并不是真正的强者。只有把追求革命和光明的人们用共同的目标和民主原则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力量。我的这位同学终于很快明白了这个时代的真理，参加到党所领导的青年组织中来。

解 放

革命的胜利比人们预计得快。严冬未尽的1949年2月，迎来了北平解放。热情高涨的大学生们，纷纷响应号召，参军，南下，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最后进军。同时，由于建设任务即将提上日程，党组织决定：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都留校继续学习。这个组织决定违背了一些同志那时的个人意愿，以至于他们“闹情绪”，还得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但它无疑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革命不单是破坏旧世界，更重要、更艰难的是建设新世界。为了建设，需要科学。这样，我们这些学自然科学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了追求科学和追求革命的统一。

掌握科学知识，准备为建设服务，这是一个层次上的统一。把由追求革命而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兴趣，同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结合起来，求得两种科学的统一，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统一。学自然科学的共产党员（学生和教员）中的一些人，就这样自然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的研究领域。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作为这个学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些学生和教员中开始了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我记得，北京市委宣传部曾经召集北京几所高等学校的十来个有理论兴趣的理工农医专业的共产党员座谈，来推动这种学习。我是参加者之一。这个校际座谈会开了几次，未能按原来预想的那样长期坚持，因为我们这些人那时担任的各种政治任务毕竟太繁重了。

病 榻

1951年，一场疾病把我击倒，迫使我卧床治疗达一年多。最初几个月的严重形势过去以后，我开始在病榻上学习和工作。我读了一些科学刊物，写了一篇评《科学通报》第3卷的文章，即《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发表在1952年1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我还看了苏联《化学的进展》、《哲学问题》、《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批评共振论的文章，拿到了刚出版的化学结构理论问题全苏讨论会记录。我初学俄文，开头差不多读一行就得查几次字典。我才读到化学系三年级，讨论中涉及的量子化学和物理化学的许多内容我都没学过。我请人给做了一个斜面的小炕几，因为双腿水肿，不能垂腿而坐，我斜卧在床上，伏在几上，吃力地、认真地翻译了这批文章，送给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1952年3月在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我译出的讨论会上的主题报告，由中国科学院出版了单行本。《人民日报》3月29日发表了我写的《反对化学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苏联科学界讨论有机化学中化学构造理论问题的情况和意义》。这两篇文章是我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最早的文章，都带有那时社会思潮的烙印，反映自己看问题幼稚的一面和学习苏联中偏差的一面。

当时，我和像我这样的一些人是把苏联这些做法当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介绍和学习的。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这些做法有许多是粗暴的、错误的、妨碍科学发展的。在收入《科学·哲学·社会》一书的《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历史情况和经验》一文中，我讲了苏联批评共振论时候的政治气氛，也讲了后来纠正错误的情况。在另一篇《自然辩证法工作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中，我在讲到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错误的时候，也讲了自己曾经翻译和介绍过苏联对共振论的粗暴批评。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点现在人们不大了解的情况：尽管总体说来苏联对共振论的批判是粗暴的，但是在讨论中，苏联许多科学家包括会议报告的作者们，还是努力坚持了一些科学的观点，如强调根据有机合成的化学实践来研究结构理论，强调运用现代物理学及其实验的和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化学结构，肯定量子化学在理论化学中的作用，特别是断然拒绝了发动和掀起这场批判的切林拆夫教授所臆造的一种“新的结构理论”，明

确指出他的理论“既与实验事实矛盾，也与量子化学的普遍原则矛盾，没有科学根据，应该予以抛弃”。在当时的气氛下，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苏联的一些科学家保持了科学的精神。

对于我个人来说，翻译和介绍这些材料，引起我去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去重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于光远、曹葆华、谢宁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我帮助做了一部分译文校订工作，这给我提供了一个仔细学习的机会），去学习西方哲学史，还引起我去读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量子化学的教科书，包括共振论创始人鲍林的《化学键的本质》。以后我选择量子化学作为自己在自然科学专业方面的进修方向，跟量子化学家郭挺章同志学习了一段时间，也是由此而来的。

岗 位

1952年10月，我的病还未痊愈，却趋稳定，我被调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简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后为科学处）。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从这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中宣部当做“阎王殿”予以摧毁，我在党的这个研究科学政策及其理论基础的岗位上工作了14年。从1954年起，于光远同志主持科学处工作，他在处内和处外聚集了一批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党的科学政策，研究科学的规律和战略，研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发展了一个（确切地说是有关的几个）交叉科学研究的集体。

逐渐聚集在处内并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孟庆哲（原来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教师），何祚庥、罗劲柏和我（我们三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先后任理学院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那时候整个理学院八个系的党员学生和教师组成一个支部），李佩珊（北京医学院的教师），黄青禾、黄舜娥（他们两人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干部），侯德彭（他是从中宣部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回来的）等人。聚集在处外的，我在下面要提到他们。

我到科学处以后，花不少时间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编书的目的很明确：让大家了解和学习列宁、斯大林

在建设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怎样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专家，以便把他们的这些思想和经验运用到我们国家的建设中。因此，集中收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有关论述。那时，《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材料的搜集，约有一半是从已有的各种选集和单行本的译本中查到和选用的，另一半是从《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原文本十月革命后各卷中查到和译出的，共编选和译出了二十几万字，于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在学习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列宁论团结和教育科学、技术专家》一文，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这是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的开始。

说到列宁、斯大林的论述，不能不特别提到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评和斯大林对语言学中的马尔学派的批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重提了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评，锋芒指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简单化倾向。我认为，这在某些方面是起了一点思想解放的作用的。斯大林这部著作发表后，苏联科学界讨论形式逻辑问题，讨论自然科学的性质问题，从斯大林对语言这种社会现象“不属于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的分析中得到引导，做出了形式逻辑、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的结论。要知道，长时期以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把自然科学列入有阶级性的上层建筑，这样的观点是相当流行的，并从苏联流传到我国。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甚至延安时期党报社论中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文章中，都有这种观点的反映。人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背景，才能理解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这个论点提出的意义。苏联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选译过来编成了一本《科学问题论文集》，由学习杂志社于1955年出版。

百家争鸣——团结中西医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党在贯彻执行团结中西医这项重要的科学政策的过程中，曾经对一种错误的理论观点，即所谓“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这种观点是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流行观点的一个突出表现。由于这种观点是由卫生工作部门的一位党员干部提出的，

曾被当做卫生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加以宣传，并且这种宣传同党的医学政策相抵触，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危害，所以，它的谬误引起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注意。党进行了许多工作加以纠正。从政策上到理论上对这种观点进行清理，影响所及，也就不限于医学领域。在这个清理过程中，1954年我在中宣部的党内刊物《宣传通讯》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我和李佩珊同志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195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特别是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年初，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会后开始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接着毛泽东同志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并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些，对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同总结苏联和我们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种种粗暴批判的“左倾”错误，是有密切关系的。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向科学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是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这项基本政策的极为重要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几年来在科学界，在党内进行过的两次反宗派主义的斗争。一次是在卫生工作部门中，一次是在生物科学研究部门中。陆定一说，在斗争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了这样一条经验：“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些本来是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关于卫生工作部门中反宗派主义的斗争，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关于生物科学研究部门中反宗派主义的斗争，这里再回顾一点历史。

百家争鸣——遗传学争论

李森科发动的、在1948年8月会议上达到高潮的对遗传学中摩尔根学

派的批判，是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一系列粗暴批判中影响最大、最恶劣的一起。这个批判迅速传到我国，我国的学术机构不但学习了李森科报告，而且还仿效了苏联禁止摩尔根学派的许多做法。这类做法造成党和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一些尖锐矛盾，逐渐引起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注意。

1950年，人们反映一所大学的领导在对待摩尔根学派观点的专家方面，违背了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中宣部和教育部都听说了这件事，刘少奇同志也表示了关注。同年6月2日，那所学校的领导人给少奇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叙说情况并有所申辩。7月15日，刘少奇同志将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中宣部和教育部的领导人传阅。7月16日，毛泽东同志批道，“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这位同志“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同一天，毛泽东同志还批阅了反映同一问题的另一份材料，指出必须彻查这个学校的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要求将这份材料与上述6月2日的报告一并讨论。查处的结果，1951年3月解除了这位同志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1952年5~6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先后三次召开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讨论和发表了《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从题目上就标明了“坚持米丘林方向”的立场，另一方面就实际解决的问题来说，则是纠正贯彻这个方向时的粗暴简单的做法，是为批判前面讲到的那位同志的错误而召开的。报告中把他的错误归结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表现为“重视点滴的生产经验，忽视系统的农业理论，强调从生产中学习，否定实验室工作”，以及所谓“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们是唯心论”的荒谬观点和“全盘否定传统生物科学”的“‘左倾’幼稚观点”。教条主义表现为“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把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去代替生物科学中的一些具体规律”（应该说，这是在我国第一次批评“代替论”）；还表现为“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一根打人的鞭子”和“掩盖自己的无知”的“护身的符咒”。报告揭露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许多具体论点和事例并一一作了分析和批评。

怎样评价这个报告呢？我认为，“坚持米丘林方向”同反对“把米丘林生物科学变成枯燥的教条”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程度和局限。前者是因袭的方面，后者是从因袭中开始摆脱的转

变的方面。从以后来看，这种转变的极不彻底是很明显的；从历史来看，这种转变却是以后进一步转变的发轫。

参加讨论和起草这个报告的，有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当时它同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科学卫生处）的赵沅、孟庆哲、何祚庥和其他单位的许多人。赵沅是处长，1952年10月我调去时，他还在任，是我的第一个上级。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时，我还没有调去，只是帮助他们做了一点查阅和分析材料的工作。

这便是陆定一同志报告中讲到的在生物科学研究部门中纠正“左倾”错误的情况。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讲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时讲到李森科问题，并且专门有一封信，请中宣部讨论这个问题，1956年8月，在陆定一同志建议下，中宣部科学处会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一个有一百几十位科学家参加的遗传学问题座谈会。会前，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编写了《关于米丘林生物学与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论争的一些材料》这本10余万字的小册子，系统地介绍了苏联1935~1956年三次论争的情况和中国1941~1956年的情况。会上，于光远同志作了两次发言。会后，于光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特别讲到青岛座谈会，说明我们的同志要努力钻研科学业务，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很好地依靠科学家，使自己成为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青岛座谈会受到科学家的热烈欢迎。不少科学家发表了支持这次会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文章。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琪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1957年4月2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同志注意到这篇文章，写信给胡乔木同志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加以转载，还亲自代拟了一个肯定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而将原题改为副题，并亲自代拟了《人民日报》编者按，“欢迎对错误彻底的批判”。

在《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篇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而作的文章中，我介绍了毛泽东同志有关这件事的一系列书信、批语和谈话。198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要一书，就以《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为书名。